

苏联研究·

苏联强制迁移远东朝鲜人问题析论

庞宝庆¹, 巩树磊²

(1. 渤海大学 历史系, 辽宁 锦州 121000; 2.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政治学研究所, 哈尔滨 150018)

摘要:在苏联卫国战争前, 斯大林从所谓国家安全利益考虑, 对一些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采取强制迁移措施, 把他们迁徙到陌生的异地他乡, 远东地区朝鲜人就是其中之一。在迁移过程中, 朝鲜移民遭到了很大的民族牺牲。

关键词:朝鲜移民; 民族政策; 苏联

中图分类号: C922.5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0961(2009)06-0069-04

一、苏联强迁远东朝鲜人的历史背景

中俄签署 1858 年《璦琿条约》和 1860 年《北京条约》后, 俄国从清政府手中夺取了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为了巩固新占领领土, 必须加快新占领土地的俄国化进程, 为此向远东地区加紧移民是非常必要的手段。在迁往远东的移民中, 大部分是来自俄国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中西部的移民, 但国外移民也占有一定比例, 其中绝大多数外国移民来自邻近的亚洲国家, 即中国、朝鲜和日本。

朝鲜人移居俄国远东地区就是这个时候。朝鲜人向俄国迁移是从 1863 年开始的, 地点大致在同朝鲜临近的南乌苏里地区。之后, 移居远东的朝鲜人越来越多, 分布地区越来越广。1906 年, 朝鲜移民达到 6 万人。在日本吞并朝鲜后, 不愿做亡国奴的朝鲜人开始大规模向外迁移, 1912—1915 年朝鲜移民数量达到 7.2 万人。1915 年, 由于兵源紧张, 俄国政府开始征集朝鲜人当兵, 一些朝鲜人为逃兵役而返回国内。1916 年朝鲜移民数量降至 6 万人左右^[1]。十月革命前, 在远东生活的朝鲜人数量仅次于中国移民人口数量。1917

年, 在远东居住的朝鲜人总数为 9 万~10 万人^[2]。根据 1923 年人口普查资料, 远东地区有朝鲜人 109 943 人, 占远东人口总数的 10.7%^[3]。

朝鲜移民都是举家迁徙, 以定居为目的。他们绝大部分从事农业, 以种植水稻为主, 也有少部分人从事采矿和捕鱼等行业。随着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展开, 朝鲜工人的数量也开始上升。1930 年, 在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中, 朝鲜人村庄也开始了集体化进程, 到 1934 年基本完成。全盘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的政策, 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一些朝鲜人外逃和劳动积极性的降低, 但由于朝鲜人的勤奋和国家的扶持, 朝鲜人的集体农庄在农副业生产上都有了较快发展。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迅速占领全东北, 苏联远东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东北生活着众多在十月革命后逃出国外的流亡者, 这些人被称为“白俄”。其中一些人投靠日本人, 为其在苏联远东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除白俄外, 被日本人利用的还有一些朝鲜人。尤其是远东的朝鲜人和日本统治下的朝鲜人存在亲缘关系, 易被日本人利用, 因此他们被认为在政治上极不可靠。而远东与伪满洲国间漫长的边界线使日本间谍的渗透活动非常容易。尤其是 1937 年日本发动对中国的全面进攻, 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使斯大林非常

收稿日期: 2009-09-15

作者简介: 庞宝庆(1974-), 男, 吉林白城人, 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 巩树磊(1974-), 男, 黑龙江大庆人, 助理研究员, 硕士, 主要从事东北亚国际关系研究。

忧虑,为免除一旦对日开战后的后顾之忧,他决定将这些朝鲜人迁到大后方去。中亚的哈萨克、乌兹别克共和国的气候和远东差别不大,可以种植水稻;加之地广人稀、劳动力极其缺乏,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接收朝鲜移民的地方。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知道,斯大林强迁远东朝鲜居民的理由,是出于国家军事安全考虑,担心远东边境的朝鲜人被日本利用,成为潜伏在苏联境内的“第五纵队”,进而危害苏联的国家安全。其理由看似有其合理性,但以所谓保护“国家利益”为借口,轻视、忽略甚至践踏少数民族的民族权益,使其举族迁移的简单、粗暴做法,则完全是斯大林模式下民族沙文主义政策的结果。

强制迁徙的做法早在沙皇俄国时期就使用过。随着国家领土的不断扩张,俄国政府采用强制手段把大量人口迁到这些边远地区,来开发和防卫这些新占领土。另外,俄国政府还把大量政治犯、刑事犯流放到边远地区。一战时期,俄国政府曾把几十万德意志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犹太人、波兰人和土耳其人等从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等地区驱赶至俄国的中部、北部和东部地区。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俄国历史上存在过这样的现象,就认定苏联也必然会产生。但至少我们可以断定苏联的强制移民与沙皇俄国的强制移民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上的延承关系。

二、苏联强迁远东朝鲜人的过程及结果

1937年8月21日发布的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共同签署的将朝鲜居民迁离边境地区的第1423-326号绝密文件,“建议联共(布)远东边疆区委员会和远东边疆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及内务人民委员部,将远东边疆区边境地区的全部朝鲜居民……迁往南哈萨克斯坦州、咸海和巴尔喀什湖各区以及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文件中指出,“迁出行动立即着手,并于1938年1月1日结束”;“对于愿意前往国外的朝鲜人不设置障碍,可以简化其出境手续^{[4]364},以方便朝鲜人出国,减轻苏联政府的负担。

根据这一决议,第一批迁移朝鲜居民工作迅即展开。迁出工作头绪繁多,在短短的四个半月内迁出如此多的人口,并安排好他们在移居地的生产、生活,时间紧、任务重,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首先要解决的是迁出和迁入资金问题。根据莫洛托夫签发的第1571-356号绝密文件,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从其储备基金中拨款6280万卢布用于迁出朝鲜人(11800户)的开支。从远东地区移居哈萨克共和国和乌兹别克共和国的朝鲜人的搬迁费标准确定为平均每户6000卢布。在这份文件的附件中,罗列了具体的迁出和迁入开支预算。迁出开支每户4000卢布(其中包括建筑物、农作物、用具的补偿费,铁路运输费用及途中的饮食、医药等的花费),迁入费用为2000卢布(包括房屋建筑、庭院建筑和供水开支)^{[4]370}。根据莫洛托夫1937年10月7日签发的第1772-388号绝密文件,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从其储备基金中拨款1.26亿卢布用于迁出朝鲜人(21000户)的开支^{[4]377}。

对于朝鲜人不能带走的动产、不动产和没有收割的庄稼按价给予补偿,迁移者的全部牲畜由畜牧收购站接收,然后在迁入地用实物补偿。在机关和企业中工作的朝鲜人职员、工人及其家属的搬迁标准参照农户的搬迁标准,并给这类家庭提供每人每天5卢布的补助费^{[4]369}。将朝鲜人迁出后所空置的朝鲜族学校和房屋划归俄罗斯学校和边防部队使用。就这样,朝鲜人在仓促间踏上了长达一个月的艰苦之旅。

由于时间紧、工作计划不细致,移民安置工作招致各方面的指责。在整个迁徙过程中,共发出列车124列,共迁移171787人(36442户)。其中,被安置在乌兹别克共和国76525人(16272户),95256人(20170户)被安置在哈萨克共和国。移民安置工作异常糟糕。斯大林曾接到库斯塔奈州朝鲜移民的报告,恳求斯大林过问以下问题:他们“于11月30日从远东到达车站,风餐露宿,拖儿带女,在严寒中苦撑了5~6日。……他们目前正处于毫无出路的境地,既没有固定的工作,又没有护照不能安排工作。没有任何机关和生产部门接纳他们工作,而州组织对有关朝鲜移民的问题不处理,甚至不感兴趣^{[4]384}。对此,哈萨克人民委员会主席伊萨耶夫于12月2日就安置朝鲜移民

问题打电报给苏联人民委员会做出说明：“我们没有经费、贷款、建筑材料、建筑机械、农业机器来实行安置朝鲜人经济生活的措施。请求您加速解决我们在上述信函中提出的问题”^{[4]385}。苏联农业银行行长也就使用朝鲜移民资金和贷款出现的问题致信给丘巴尔：“朝鲜人处境困难，没有得到用以补偿留在原地财产的钱，教师没有领到工资，集体农庄庄员没有工作，城市中买面包的队伍接连不断，有疾病流行，住房的情况糟透了。”^{[4]394}

而乌兹别克的组织工作也好不了多少。12月14日，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的业务秘书格里沙宁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切尔内绍夫电话汇报了乌兹别克的朝鲜移民安置情况：“尽管有我的多次警告，尽管有乌兹别克斯坦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决议，移民的经济生活安排仍然特别不好。农业人民委员部阻挠移民经济生活的安排工作。移民集体农庄的组织工作至今尚未完成……水利灌溉工程没有进行……移民对他们在远东边疆区居住点交出的牲畜和工具的索赔要求未被考虑。急需的种子贷款未被考虑，而几百户人家急需粮食支援。以阿利耶夫为代表的农业人民委员部领导，表现出组织工作上的无能，以及对待政府安置朝鲜人生活决定的令人不能容忍的莫不关心，其结果是移民产生不满情绪。”^{[4]389}

在各方的压力下，哈萨克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伊萨耶夫就朝鲜移民安置问题致信丘巴尔，为在移民工作中的失误进行开脱，并向中央要求财政支持：“必须给工人和职员发放建筑贷款，按每户平均1000卢布计，总共130万卢布……为农庄购买马匹和车具的贷款总额为469.7万卢布，为修建浴室规定的贷款总额为210万卢布……并请求苏联人民委员会补充拨给迁居款额402.3万卢布。同时要求：苏联财政委员会将1938年按国家预算拨款的总额定为1307.54万卢布，用于移民的行政管理、经济建设、学校建设和医疗卫生建设。农业银行在1938年对朝鲜人的集体农庄发放长期贷款，总额为7458.7万卢布，用于文化生活建设”^{[4]392}。

鉴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在移民工作中的拖沓，苏联人民委员会为统一管理朝鲜人移民问题，决定由切尔内绍夫等七人组成专门委员会，制订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安置从远东边疆区移民到哈萨

克和乌兹别克苏维埃共和国的朝鲜人的措施，委员会的工作期限为七天。莫洛托夫就朝鲜移民安置问题发电报给乌兹别克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对其工作提出严厉批评：“乌兹别克斯坦的朝鲜移民经济开发进行得很不像样。调拨资金和物资的消耗毫无计划，不考虑移民的需要和要求。”

鉴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和国在移民安置方面的混乱，1938年1月5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在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朝鲜族移民的住处和经济安排的措施》和《关于在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朝鲜族移民经济安排的措施》，责成乌兹别克、哈萨克对移民做出经济安排。该文件明确指出，将大部分朝鲜人的农业单位分别安插在哈萨克人的农场和集体农庄中，其余组成朝鲜人独立的集体农庄、渔庄，并由苏联农业银行向集体农庄提供贷款用于经济发展；保证迁居朝鲜人中工人和职员的就业安排。

但哈萨克、乌兹别克却对移民安置工作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甚至宣传工作也没有跟上，导致移民强烈不满。1938年1月29日，朝鲜移民代表朴义利就朝鲜移民安置问题致信莫洛托夫，就移民的困顿、迷茫、焦虑和今后的移民安置问题向莫洛托夫提出请求。信中说：“由于处在束手无策的境地和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我特向您，政府领导人请求解决我们民族以后的命运问题。……我们至今没有找到任何工作，因为这地方只是一片黄沙，在那上面什么也种不出来。不仅如此，连水也是咸的，任何地方也找不到一滴淡水。……我们是定居者而不是游牧者，我们不习惯这里的气候条件和其他生活条件……所以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定居丝毫不能朝好的方向解决我们今后的民族命运问题。……因此，恳求国家：第一，把我们迁移到亚速海的渔场，阿斯特拉罕州加姆扎特区，或者到什么地方栽种稻谷，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去务农，我们可以在国家认为需要的地方组成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第二，发给我们生活津贴，我们中间有人在挨饿。”^{[4]412}2月10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就这封信提出的问题向莫洛托夫建议，“必须责成米尔佐扬同志和伊萨耶夫同志立即实际着手朝鲜集体农庄庄员的经济安排”；并认为“眼下他们的活动只表现为写信和提出不同建议，没有任何具体措施”；在此基础上他向莫洛托夫忠告，“这样

的情况确实有破坏朝鲜人集体农庄的春播运动的危险,还会使他们的经济安排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代价更高^{[4][413]}。

1939年1月8日,切尔内绍夫就朝鲜人移民经济安排问题致信莫洛托夫,对朝鲜人安置问题做出总结。他认为,在朝鲜人迁到中亚一年后,朝鲜人的生产、生活逐步稳定,但也有问题,如哈萨克共和国“还没有发给朝鲜人集体农庄土地永远使用证。这在农庄庄员中引起担心,担心他们的土地规划带有临时性……部分集体农庄中,学龄前儿童和学生营养问题十分尖锐,那里的收成很低”。而在乌兹别克共和国,“朝鲜人对分与的土地和定居的地区是满意的。许多集体农庄庄员认为,在新的居住地比迁移以前生活的更好……”^{[4][431]}。

朝鲜移民被迁到中亚后,在当地生疏、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但在苏联政府的帮助和本身的努力下,克服房屋、粮食、种子不足等困难,终于在中亚又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大量的荒地开垦出来,水稻也开始在中亚种植。朝鲜移民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终于在中亚站稳了脚跟。

但我们要指出的是,朝鲜人背井离乡来到中亚,不仅遭到经济损失(如离开远东时所交出的牲畜,在中亚大部分一直没有得到补偿),而且朝鲜移民的人身自由也受到一定限制。朝鲜人虽然持有身份证,但必须在定居地生活五年,不得随意迁徙外地。这种歧视性状况到50年代后才得以改变。苏联解体后的1993年4月1日,叶利钦签署《关于为俄罗斯的朝鲜人恢复名誉》的总统令,压在朝鲜人身上的精神重负终于得以卸下。

三、对苏联强迁远东朝鲜人的历史反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苏联对朝鲜居民强制迁移的做法并不是孤立的事件,与朝鲜人命运相似的少数民族还有很多。但通过对朝鲜居民在苏联的命运考察,却能非常好地折射出当时的历史映像。

近代以来,因为各种原因移居到俄国远东地

区的朝鲜人,通过其不懈努力已经完全融入了当地社会生活,并通过其辛勤劳作对俄国远东的开发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十月革命爆发后,朝鲜人积极参加了对白卫军的武装斗争。国内战争结束后,朝鲜人积极参加远东的经济建设,并配合苏联政府各项政策的实施。在推动了当地经济和文化事业发展的同时,朝鲜居民的经济和文化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

但苏联最高当局却不顾上述事实,在日本军事威胁下竟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置全体朝鲜人利益于不顾,将其迁移到荒凉的中亚。当然,苏联当局为安置迁移到中亚的朝鲜人而制定的计划中规定得还是比较周到的。虽然主观上要保障朝鲜人的利益,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对朝鲜人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如苏联政府为迁移朝鲜人专门做出预算,给每户朝鲜人发放补偿费和目的地安置费,在路上发放伙食补贴。但在转运途中和在目的地安置工作上,由于时间紧、准备仓促,加之政府工作人员工作方法的简单、粗暴,朝鲜人的利益遭到很大损失,甚至一度将朝鲜移民作为“特种移民”进行管理。

从朝鲜人在苏联的遭遇可以看出,斯大林在处理民族问题时犯下了一系列错误,如以阶级矛盾代替民族矛盾,以对待敌我矛盾的方法解决出现的民族问题;以国家利益代替民族要求;以逐渐增长的大俄罗斯主义代替了平等、相互尊重的民族关系。过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使整个国家变成了一架容易操作的大机器,使国家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并由它管理和统治一切。所以,我们说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强迁少数民族历史现象能够发生的主要因素。

参考文献:

- [1]初祥. 俄罗斯远东朝鲜人的命运[J]. 西伯利亚研究, 1997, (6).
- [2]彼得罗夫. 1860—1917年间的俄国远东朝鲜人[J].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学报, 1998, (5).
- [3]金信河. 苏联朝鲜人社会[J]. 民族译丛, 1983, (6).
- [4]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G].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刘润南]